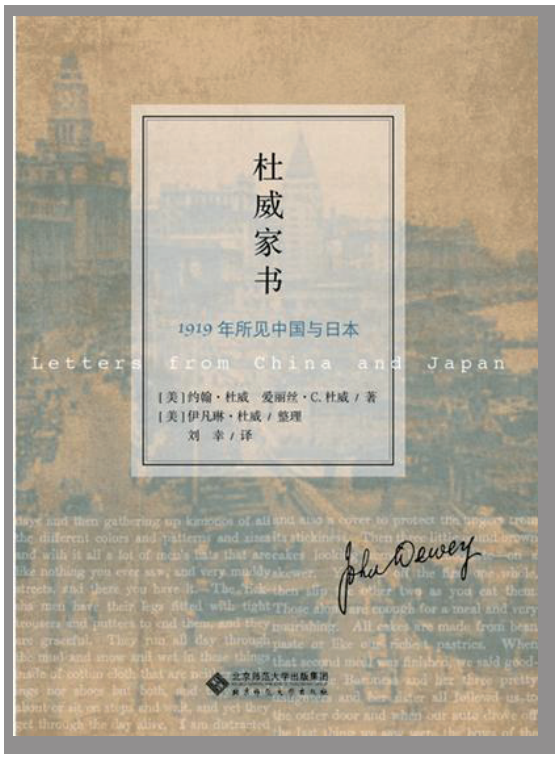
一份迟到了百年的时代见证



《杜威家书》
约翰·杜威 爱丽丝·C·杜威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1919年5月1日早晨,美国哲学家、教育家约翰·杜威在上海的寓所里醒过来。这一天,杜威给美国家中的子女们写信:“我们在中国睡了一晚,但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,因为整个中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。”

多半是因为舟车劳顿,5月1日的这封家信写得并不长。这一天的杜威大概也绝难料想,从那时候起,他将要在这个“还谈不上什么印象”的中国滞留长达两年零两个月,行遍十一个省,在各地举行大小两百余场演讲。杜威将带动着实用主义思潮,尤其经过胡适等人的发酵,席卷整个中国的教育界和思想界。

日本之行

事实上,刚到东京,杜威夫妇就开始用书信给子女们介绍起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。东京的喧闹、女儿节的人偶、商店里的周到服务、壮丽的富士山和秀美的日式庭园,都被杜威一一记在了笔端。

日本朋友是以高规格招待杜威的,杜威也投桃报李,精心准备了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讲,这就是后来他的名作《哲学的改造》一书的雏形。在3月5日的家书里,他开篇就说:“我现在已经举行了三次演讲。他们真是很耐心的民族,还有很可观的听众,大概五百人左右。”可是根据记载,杜威的第一讲,其实到场了一千余人,可见人数是逐次减少的。将杜威的在日演讲形容为高开低走,只怕并不为过。

不过,更让杜威感到忧虑的是高度集权的天皇制下,日本社会中的隐约可见的压制和束缚。杜威明确地感知到,明治维新以来狂飙突进的日本“如此迅猛地跻身于第一流的国力,以至于在许多方面都毫无准备”,因而不得不搬出天皇制,使之成为“一个统一且现代化的日本的象征”,但这种天皇崇拜,又反过来“成了压在日本人身上摆脱不掉的东西”。

杜威的日本之行只有两个月。就在他刚刚熟悉起日本的方方面面时,他又和妻子来到了中国。

亲历五四

在到中国后的第一封家书里,他就说:“我饶有兴趣地想要知道,在这个真正意义上非常古老的国家,人们是不是也像在日本一样大量讨论‘万世一系’。”所谓万世一系,指的正是天皇制。当时的中国人显然没有那么重的精神包袱,反而让杜威觉得“很有人情味”。和善,爱笑,这是杜威对中国人的印象。

但这种和善的反面,又往往近于犬儒。1919年的中国,北洋政府当道,谁也不知道国势将走向何方。杜威敏锐地注意到,中国人的口头禅就是“谁知道呢”。犬儒的精神之下是涣散。走在街头,杜威眼看着无数没有学上的孩子,长着一张张老成的脸,无所事事地晃荡在街头。谈及此事,他在家书里流露出的那种痛心感,到今天都格外扎眼。如果说日本是一个极端,那中国未免不是另一个极端。

就在这个当口,一件改变中国近现代史轨迹的事情发生了,那就是“五四运动”。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刺激了中国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矛盾。5月4日,众多学子聚集天安门,打出了“外争国权、内惩国贼”的口号,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随后各界响应,罢工罢市,终于促成北洋政府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“五四运动”不只是五四当天的游行活动,更是一个长达数月的连续事件。从5月12日,杜威第一次在家书中谈及北京的风波开始,之后的家书里,他就持续不断地关注着运动的走向。

北洋政府的压制和普通民众的淡漠一度让运动走入低潮,但杜威始终坚信学生们的韧性。果然,这一次学生们以稚嫩的肩膀承担起了民族的重任。6月,运动进入高潮。杜威夫妇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,宣传抵制日货、拒签条约、保障自由。杜威在家信里说,“学生们曾经钻研过日本的进口商品里有哪些可以不借用资本,而直接用手工劳动来代替。等他们钻研成功之后,他们就去商店,告诉大家如何制造,如何贩卖,同时还发表演讲。”而后,北洋政府又实施了大规模的逮捕,甚至一度将北大校舍变为临时拘留所。但学生们全无畏惧,纷纷向学校涌来,“并且加强了四处演讲的活动……北京当局不能再拘捕更多的学生,只好驱散深深受感动的听众”。杜威就敏锐地感觉到,“总体来说,警察的溃败已经是注定了的”。

不久,天平果然开始向学生一方倾斜。6月10日,曹汝霖、章宗祥和陆宗舆的罢免令公布。各界人士继续抗争,终于使得驻巴黎的代表团28日没有在巴黎和约上签字。7月2日,杜威极其兴奋地在家书里写道:“今天的新闻就是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巴黎和约。这条新闻真是太好了,都不像是真的。” **(来源:新华悦读)**

熊彼特的“创新”理论

《经济发展理论》
约瑟夫·熊彼特
商务印书馆

在经济学家中,姓名能够被后世用以命名一个学派的,可谓凤毛麟角。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·熊彼特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于1912年出版的《经济发展理论——对于利润、资本、信贷、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》(以下简称《经济发展理论》)一书,以“创新”概念构建一种与主流经济学迥异的经济理论。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,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奉为圭臬的“新熊彼特学派”的研究成果,对各国科技与创新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全书中文和英文译本共六章,熊彼特在前两章中,分别阐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和对应的两种经济理论体系。在第一章中,熊彼特描述了静态的交换经济体的基本特征: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组合生产要素,产品再按市场价格交换和分配,经济均衡是一套商品价格与数量的关系;企业家仅是生产管理者,货币仅有流通职能,经济体周而复始地进行简单再生产。不难理解,这种经济理论其实就是今天的新古典主流经济学。

但是,历史与现实均表明,经济均衡仅是一种理想状态,经济体具有发展的内生动力。熊彼特在第二章中探究了经济发展的内生机制,系统地阐述了创新与企业家理论。他认为,经济发展的动力不是均衡理论所宣称的消费者需求变动,而是生产者以新的方式重新组合现在的生产要素,即创新。经济发展是创新打破旧均衡、推进新方式的“创造性毁灭”过程。创新包括产品创新、工艺创新、市场创新、供应链创新和生产组织创新等五种典型形式。熊彼特并没有止步于此,而是用创新概念重建了经济学理论大厦,其中若干要义仍然具有当代意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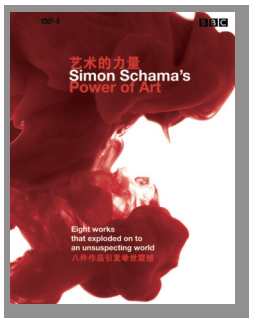
他重新界定了“企业”和“企业家”。企业的基本职能是创新,执行创新的人便是“企业家”,他们并不只是企业主、资本家或者高级经理人,而是一种具有创新使命感的精神气质。企业家精神广泛分布于社会成员当中,并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阶层。我国所提倡的“万众创新”,本质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,激发和释放全社会成员潜在的创新精神。

熊彼特还严格区分了“发明”与“创新”。只有成功实现了商业化的发明,才可以被称之为创新。可见,熊彼特的创新理论,在本质上极为重视市场机制在创新要素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。在我国政策实践中,混淆发明与创新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,不仅影响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,而且难以缓解科研与经济“两张皮”的结构性矛盾。

他突出了金融对创新的支持作用。企业家仅有创新意愿是不够的,还需要有创新行为。但是,创新只有在未来取得商业成功后才有回报,引导生产要素向企业家集中,就必须借助金融手段。所以,没有一个与企业家创新相匹配的金融体系,经济发展将无从谈起。我国已经确立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,按照金融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重新认识现代金融的本质,深入推进金融体系的改革,无疑具有紧迫性。

他强调了利润仅是对创新者的回报。创新过程只不过是企业家以“意志与行为”运用了现有的生产要素,创新所创造的利润只能是对企业家创新“意志与行为”的回报。正是在熊彼特学说的影响下,企业家精神才成为一种独立且稀缺的生产要素。利润源自创新,创新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,利润与经济发展是共生共灭的。这一理论逻辑的现实意义在于:深化收入分配机制改革,尊重和保护创新者的合理收益,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。 **(来源:新华悦读)**

悦读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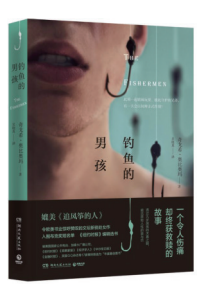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艺术的力量》
作者:西蒙·沙马
出版社: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

《艺术的力量》是一部充满哲理与激情的艺术史作品。八位艺术大师拥有自成一派的创作风格和鲜明的个性,全面剖析艺术大师们鲜为人知、扣人心弦的故事。

《世界多一位Mr.Me》
作者:王希翀
出版社:长江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新生代作家王希翀最新创作的图文并茂的散文集,记录了作者在北京、香港、武汉、长沙和首尔五座城市的所见所感所悟,有作者对遇见的人的关切,有作者对生活中细腻情感的描写,作者希望通过这本书能让读者从中找到自己内心的答案。



《钓鱼的男孩》
作者:奇戈希·奥比奥玛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钓鱼的男孩》主角阿格伍一家住在尼日利亚西部的阿库雷。趁父亲不在,团结友爱的兄弟四人来到一条禁河钓鱼,他们遇见了疯子阿布鲁。阿布鲁预言四兄弟中的老大会被另一个兄弟杀死。就这样,预言在亲兄弟间埋下仇恨的种子,他们再也不似从前亲密。惨剧也真如“预言”所说,接二连三地在这个家庭上演。